



# 從青聯會到救國團成立的過程 ——一九五〇年代初期國民黨對 於青年運動的籌劃與掌控

李泰翰\*



---

\* 作者為東吳大學歷史系兼任講師，服務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

## 一、前言

中國青年反共抗俄聯合會（以下簡稱青聯會）是一個 1950 年代初期十分活躍的青年團體組織，從 1950 年 4 月 27 日成立直至中國青年反共抗俄救國團（以下簡稱救國團）成立後「自動」歸併到救國團中，兩年多的時間，曾多次舉辦大規模的青年活動，對此，如金石允便指出，青聯會是救國團成立之前最重要的反共青年團體，<sup>1</sup>而於 1952 年 10 月 31 日所成立的救國團，便常將其視為自己的「前身」，而這個聲稱亦為人所接受。<sup>2</sup>

在若林正文的研究中指出，救國團是個具有複合任務的組織，不但作為黨國體制的輔助機構：是動員及控制青年／學生的機構，同時還作為國民黨內權力競爭新手的蔣經國個人的權力基礎，重要性自不容忽視。<sup>3</sup>

因此，過去研究成果對於救國團的議題探討相當豐碩，然而對於青聯會的論述較為欠缺。研究者除將焦點置於救國團所舉辦的青年活動議題外。如施俊文、陳三井二位，便分別探討蔣經國與救國團兩者的關連性。<sup>4</sup>金石允則從依從關係分析救國團成立的原因，同時提出救國團隸屬於國防部是由於為了舉辦在校學生軍訓及青年戰鬥訓練，需由軍方支援的緣故。<sup>5</sup>陳光中認為救國團的創立，是為了讓學生在他們正式被徵召前熟悉戰鬥技能，並且在國民

1 金石允，〈從依從關係探討救國團組織特性〉，國立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 05，頁 6。

2 林蔭庭，〈追隨半世紀—李煥與經國先生〉，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1998，頁 62。

3 若林正文，〈台灣一分裂國家與民主化〉，台北：月旦出版社，1994.07，頁 120。

4 施俊文，〈蔣經國先生與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20 輯，1999. 08，頁 447-478；陳三井，〈蔣經國先生與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近代中國》，92 期，1992. 12，頁 35-49。

5 金石允，〈從依從關係探討救國團組織特性〉，國立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文。

中學之上建立一個政治作戰網絡，企圖灌輸青年人「正確」的意識型態。<sup>6</sup>而 Thomas A. Brindley 則提出救國團成立實與過去失敗經驗有關，成立的目的在於導引學生走向正確方向，同時採取訴求及利誘的方式，引導青年，而非訴諸暴力與激進手段。<sup>7</sup>此外，在分析國民黨對於青年的掌控問題上，龔宜君細緻化處理了國民黨的權力滲透，著重於國民黨在校園中所建立的知識青年黨部。<sup>8</sup>而陳曉慧則主要探討國民黨的改造問題，亦兼論及中改會對青年運動的部分規劃內容。<sup>9</sup>

目前研究成果大致已釐清救國團成立以後的相關課題，但是，似未能進一步探討青聯會與救國團兩者的彼此銜接過程，也較少從兩者與國民黨的互動關係著眼。救國團是在何種情況下，在國民黨內被規劃成立，並取代青聯會，而成為主導臺灣青年運動的團體？蔣經國又是在何種情況下，將救國團當成自己的權力基礎？本文即以此作為論述主軸。資料運用上，主要以原始檔案、會議記錄、回憶錄及當時的期刊、報紙、論著與活動資料等作為立論依據，期能更進一步釐清上述課題。

6 陳光中，〈社會運動發展中政府的角色：中國青年救國團的一個詮釋〉，《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報》，26期，1993.05，頁67。

7 Thomas A. Brindley, *The China Youth Corps in Taiwan*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1999.)

8 龔宜君，〈「外來政權」與本土社會—改造後國民黨政權社會基礎的形成（1950-1969）〉，台北：稻鄉出版社，1998.08；〈黨國體制下的台灣校園：國民黨改造後知青黨部對校園的滲透〉，《現代學術研究》，7期，1995.12，頁105-128。

9 陳曉慧，〈中國國民黨改造之研究（1950-1952）〉，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0.06；〈中國國民黨改造運動中對社會基礎的強化〉，《藝術學報》，63期，1998.12，頁209-229。

## 二、救國團的「前身」—青聯會

### (一) 青聯會的成立與運作

青聯會於 1950 年 4 月 9 日，於台北各界青年春季晚會中決定組成，12 日假中山堂召開第一次籌備會，推定台大、師院等單位為籌備會常務委員。隔兩天，舉行第二次籌備會，除邀請張其昀、蔣經國、鄧文儀、倪文亞、傅斯年、程天放、浦薛鳳、上官業佑、劉真、朱虛白、左潞生、顧柏岩等先生擔任指導委員外，亦在會中號召各界青年團體踴躍參加，以共同完成神聖使命。23 日開始以廣播號召，並於中山堂一連四天舉行「控訴共匪暴行大會」，上演戰鬥話劇「青年進行曲」，接著，25 起組成二十個宣傳小隊，分別在台北各處要道、公共場所普遍宣傳之後，該會遂於 27 日正式成立。<sup>10</sup>

該會成立之初，由第三屆總幹事曹志源的回憶指出，青輔會的辦公室坐落在當時博愛路和衡陽街交口的國貨公司三樓。而在「總幹事之下，設有許多辦事的組室，如新聞室、總務組、聯絡組、服務組、活動組等等，每組都僱有一、二位專任人員負責。大多是大陸各大學業已畢業或在校的學生，大家都是深受共禍摧殘，思想反共的流亡青年。除了名義上由總幹事主持會議共商大計外，一切實際工作，都是由他們以及各校學生代表在辦」，<sup>11</sup>可知，青聯會似乎在運作上頗具規模。

在中山堂成立當天，決議由台灣大學彭守志當任主席，曹志源認為「也許是因台大當年規模最大，人數最多的關係，台大的代表，並當然地被大家

<sup>10</sup> 鄭清漢，《反共建國小叢書甲類之六一自由中國青年在戰鬥中》，台北：改造出版社，1953.

<sup>11</sup>，頁 8-9。

11 曹志源，《國內國外二十年（1949-1969）》，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7.03，頁 39-40。

選舉為該會總幹事」。<sup>12</sup>而由台灣大學、行政專校、台北工專、師範學院、中國回教青年反共抗俄大同盟、青年服務團、公路局、台北一女中、女子師範、台北師範、師院附中、青年軍聯誼會、成功中學、台北商職、人力車工會等十五個單位出任理事，<sup>13</sup>可見該會是由學校、機關、團體作為單位所組成，而非以個人為單位，同時並不侷限於學校青年參與。

10月31日，青聯會於台大法學院禮堂舉行第一次代表大會，<sup>14</sup>開幕時蔣介石總統特來參加並特頒訓詞，指出這次青年大團結的使命，較過去更為重大，希望青年能夠擔負起這個神聖的使命，並於會後召見全體代表，可見蔣介石總統對此會的重視。<sup>15</sup>

該會成立之初，曾高喊「中國要是古希臘，台灣就是斯巴達；中國要是德意志，台灣就是普魯士」的口號。為了倡導戰時節約、節省汽油，成員分頭到菜市場、學校門口進行宣導，若見女眷搭公家汽車買菜或小孩搭公家汽車上學，立即上前勸導，據稱還曾經攔下過陳誠的座車。<sup>16</sup>同時為擴大喚起反共意識，也提倡反共藝術、舉辦青年戰鬥晚會、大型抗暴簽名與募捐勞軍等運動，<sup>17</sup>亦曾印製「敬告大陸青年朋友書」數十萬份，空投大陸。<sup>18</sup>而該會所舉辦的活動，其中又以「暑期青年軍中服務」，最具規模。

自1951年夏天起，青聯會開始發動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參加暑期軍中服務，希望能夠藉由該項活動與將士們同甘共苦，給予他們適時地物質及心靈

12 曹志源，《國內國外二十年》，頁39。

13 鄭清漢，《自由中國青年在戰鬥中》，頁9。

14 徐羽，〈革命青年的新頁—記青聯會首屆全代會〉，《自由青年》，革新卷第三期，1950.11.10，頁11。

15 鄭清漢，《自由中國青年在戰鬥中》，頁10。

16 林蔭庭，《追隨半世紀—李煥與經國先生》，頁62。

17 鄭清漢，《自由中國青年在戰鬥中》，頁12-13。

18 鄭清漢，《自由中國青年在戰鬥中》，頁10。

方面的慰藉，而這項舉動則獲得教育當局與軍方的高度配合。7月間青聯會公佈暑期青年軍中服務辦法，訂出十五個服務地區，除本島之外，遍及澎湖、金門、馬祖、大陳等地，編組以每校至少一隊，每隊三十人為原則，同時規定服務隊應由各校訓導主任或課外活動組主任擔任領隊，負責指導監護，並由該地區駐軍最高政工單位，指定校級政工人員，為駐隊指導員，負責聯繫及協助。參加隊員集中講習一週後，始分發至各部隊服務。講習所需之文宣及參考資料，均由國防部總政治部印發。<sup>19</sup>由此可見，青聯會所舉辦的軍中服務與國防部總政治部的關係甚為密切。

軍中服務所規劃工作，主要以文化宣傳與軍中康樂及服務為主，<sup>20</sup>；而原訂以1,800人編制為60隊的構想，截至七月下旬擴充至2,500人，並在8月1日先後出發。軍中服務結束之後，為擴大辦理敬軍勞軍活動，又決定成立軍人之友社，負責辦理相關事宜。<sup>21</sup>

隔年（1952年），軍中服務之規劃改由國防部總政治部與台灣省教育廳邀集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二組、國民黨台灣省黨部、財政部、北部防守區政治部、軍人之友社、青聯會總會等機關團體舉行座談會，會中作出參加入數加倍，經費由教育廳、總政治部編列預算，而商請台灣省政府撥發等八點建議。隨後，推請台灣省教育廳長擔任服務隊總隊長，總政治部副主任擔任副總隊長，<sup>22</sup>可知，軍中服務有擴大舉辦及層級提高之趨勢。該年規劃軍中

19 鄭清漢，《自由中國青年在戰鬥中》，頁30-32。

20 文化宣傳方面，例如編寫壁報、舉行演講、時事報告及各種座談會與規劃反共抗俄展覽會等，並為將士們閱讀書報、講述暴俄侵華史實與控訴共匪暴行等；而軍中康樂及服務，則以教唱歌曲、舉辦大合唱、舉行體育舞蹈表演、舉辦同樂晚會、表演話劇、平劇、口琴、演奏等，同時介紹衛生常識，協助改善軍中衛生、協辦各種球類、棋類競賽及團體遊戲、舉辦軍中聯誼會、為傷患官兵洗補衣服、慰問傷患官兵或軍眷與協助軍中醫院護理工作等。

21 鄭清漢，《自由中國青年在戰鬥中》，頁30-31。

22 〈青年暑期軍中服務，今年決擴大舉行〉，《中央日報》，1952.05.06，第四版。

服務人數預定為 4,650 人，預計編成 155 隊。<sup>23</sup>而於 7 月 22 日開始講習，一週後，各隊便浩浩蕩蕩地展開軍中服務。<sup>24</sup>

然而，若深入觀察軍中服務隊的實際「服務」情況，其實軍中服務不僅具有「勞軍」意涵，同時也充滿「宣傳」意味。讓我們以一支由台中一中所組成的服務隊為例，連同領隊共 37 人的隊伍（不含指導員及記者兩名隨隊）赴南投 21 天的軍中服務過程中，所動用的人力、物力甚為驚人。不但接受了地方各界長官的接待、民眾的夾道歡呼、聲勢浩大的遊街繞境，以如此盛大的歡迎場面與排場，明顯可知宣傳意涵並不亞於服務成效，<sup>25</sup>同一時間，全台及離島、外島尚有一百多支「軍中服務」的隊伍，正在接受如此這般禮遇的「款待」。或許值得補充的是，這種透過讓青年學生實際參與、體驗軍旅的活動，其實正是日後救國團所舉辦青年戰鬥訓練／活動的雛形。

## （二）青聯會的定位與歸屬

青聯會何以能在五〇年代初期的台灣，陸續舉辦大規模的活動，並獲得政府及軍方、教育單位的大力支持，其原因何在，是否如同該會於 1950 年 4 月 17 日對外舉行記者招待會所宣稱：「青年人自己的組織，由青年人自己建立，希望青年人自己去推動」。<sup>26</sup>其與黨政軍的關係為何，似乎值得探究。

中國國民黨於 1950 年 7 月 26 日，決定成立中央改造委員會（以下簡稱中改會），進行黨的改革工作。在江山色變以後，蔣介石曾指出失敗的原因包羅萬象，其中黨的失敗，更是最致命的要素，因此著手重組黨內權力結構，

23 〈暑期軍中服務辦法大致決定〉，《中央日報》，1952.05.10，第四版。

24 〈青年暑期軍中服務項目訂定〉，《中央日報》，1952.06.09，第五版。

25 臺中一中軍中服務隊，〈南投一日通訊〉，《軍中服務在南投》，臺中：臺中一中軍中服務隊，手抄本，1952.9.16。

26 鄭清漢，〈自由中國青年在戰鬥中〉，頁 8。

刻不容緩。改造下的國民黨，企圖以群眾作為其力量之基礎，這在若林正文認為，是已學到 Lloyd E. Eastman 所指出的教訓。<sup>27</sup>

中改會了任命 16 位改造委員，<sup>28</sup>下設各種工作部門、委員會負責各項黨的改造工作，而蔣介石則為最高的決策者。在中改會下分一處、七組及五會等，負責各項計畫及推動等業務。各單位的主要負責人皆為蔣中正任命，如第二組派谷正綱擔任主任委員，而幹部訓練委員會則派蔣經國擔任主任委員。<sup>29</sup>

中改會成立後，對於青年如何組織及訓練相當重視，除了希望培育黨的幹部，貫徹黨的決策；另一方面也期盼一般青年學生能夠服從黨的帶領，參與有利於黨的活動。而國民黨在青年的組訓，主要以兩種型態作為領導：一者以直接設立黨部方式進行，另一則以黨團方式領導。前者即為「知識青年黨部」的設立。

---

27 若林引述 Lloyd E. Eastman 所指：「蔣介石在大陸失敗的原因之一是，蔣將政治理解為精英之間的競爭，而沒有理解到在此之外，藉大眾動員也可以構築權力泉源」。參見若林正文，《台灣一分裂國家與民主化》，頁 119-120。

28 十六位改造委員分別為：陳誠、張其昀、張道藩、谷正綱、鄭彥棻、陳雪屏、胡健中、袁守謙、崔書琴、谷鳳翔、曾虛白、蔣經國、蕭自誠、沈昌煥、郭澄與連震東等人。

29 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 1 次會議紀錄，油印本，1950.08.05。在此次會議中，首先確立中央改造委員會的組織架構，其各單位分別為：

秘書處：掌理本會議事務、總務、文書、人事及黨員之撫卹與其他不屬於各組會執掌之事項。

第一組：掌理自由地區及大陸地區各級黨部或秘密工作之組織與黨員之訓練及指導其活動。

第二組：掌理產業職業等團體知識青年及其他特種黨部之組織與黨員之訓練及指導其活動，並負有關民眾運動指導之責。

第三組：掌理海外黨部之組織與黨員之訓練並指導其活動。

第四組：掌理宣傳工作之指導設計黨義理論之闡揚對文化運動之策動。

第五組：掌理民意機關與政府機關黨員之組織與政治活動及各反共抗俄民主政黨聯絡之有關事宜。

第六組：掌理對社會經濟政治等動態有關資料之蒐集整理研究與對敵鬥爭之策劃。

第七組：掌理黨營事業之管理及黨員經濟生活之輔導。

幹部訓練委員會：掌理幹部訓練有關業務。

紀律委員會：掌理黨紀案件之審議及監察黨員執行黨的政策決議命令之有關事宜及決算之審核。

財務委員會：掌理本黨財務之統籌及預算之審議黨費基金之募集保管與運用事宜。

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掌理黨史史料之搜集整理編纂及革命文獻之保管事宜。

設計委員會：掌理有關加強黨政及反共工作之設計及本會交議案件之審議。

中改會第 29 次會議（1950.09.29）中，決議修正通過「中央直屬知識青年黨部設置原則及組織規程草案」，<sup>30</sup>隨後，陸續在大專院校設置國民黨的知識青年黨部。<sup>31</sup>

另外，藉由黨團來領導者，以國民黨外圍團體或不屬於國民黨所成立之團體為主。在中改會第 63 次會議（1950.12.18）中，草擬「知識青年黨團組織通則草案」。訂定「凡青年團體或集會有本黨黨員三人以上時，經縣級以上黨部之決定，得組織黨團，對外絕對秘密」，<sup>32</sup>藉以增強黨對於青年團體或集會的掌握及領導能力。而國民黨對於青聯會，即是以黨團方式加強控制。對此，中改會第 164 次會議（1951.07.2）記錄中便提到：

查中國青年反共抗俄聯合會為當前號召青年從事反共抗俄之唯一全國性青年團體，一年餘來對反共抗俄宣傳及社會服務工作之推行頗為努力，茲為加強領導計，特根據知識青年黨團組織通則之規定，組織黨團定名為「中國國民黨青年反共抗俄聯合會黨團」，經將該會所有本黨同志分編為十三個聯絡小組，選舉張樞等十三同志為組長，並以依照規定指定該十三同志為幹事並指派張樞為書記。<sup>33</sup>

另外，亦可從中改會於第 78 次會議（1951.01.29）所修訂通過的「中國國民黨現階段青年運動指導方案草案」觀察，其認為青年運動的領導應從思想及組織兩方面著手。而將以「各種學術康樂團體，為一般學校青年的主要組織。」同時「扶植青年反共抗俄團體的發展，並健全其組織，使全國各階層青年均能從事反共抗俄的工作」，並且「配合軍事需要，發動青年成立戰地服務、軍中服務、防護服務等組織。」<sup>34</sup>由此可見，青聯會等團體所舉辦的軍中

30 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 29 次會議記錄，油印本，1950.09.29。

31 彭宜君，〈黨國體制下的台灣校園：國民黨改造後知青黨部對校園的滲透〉，頁 113。

32 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 63 次會議記錄，油印本，1950.12.18。

33 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 164 次會議記錄，油印本，1951.07.02。

34 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 78 次會議記錄，油印本，1951.01.29。

服務，實與國民黨的青年運動指導方案，有相當關係。

然欲進一步釐清青聯會，不能僅由其與國民黨的互動作觀察。藉由暑期軍中服務，得知悉該會與總政治部的軍方互動甚密。時任總政治部主任的蔣經國，不但為該會的指導委員，同時大力支持青聯會所舉辦的軍中服務。這種現象，隨著蔣經國檔案的開放，可以在《忠勤檔案（總政治部任內重要文件）》獲見，在檔案中自稱學生的潘振球向昔日教育長蔣經國報告〈教育廳及各校校長對於目前青年運動的之看法〉時，便提到「（教育廳及各校校長）認為青聯會是政治部（指的是由蔣經國擔任主任的國防部總政治部）或第二組（指的是由谷正綱擔任主委的國民黨中改會第二組）的一個團體」，<sup>35</sup>而曹志源的回顧錄中也指稱：「青聯會的最高指揮者即今總統蔣經國先生」，<sup>36</sup>可見青聯會在領導權上，似乎並不統一。這種不統一的現象，恰能反應國民黨在遷台之初，對於青年運動的掌控，並未具有一個統整性。因此，青聯會被視為是雙頭馬車下的團體，而與黨軍的關係都相當密切。

該會身份獨立於教育體系之外，但卻又與教育有著密不可分的關連性。青聯會與教育當局的互動，在潘振球的文中可見：「教育廳及各校校長認為『青聯會的一切通知是一種命令（這也許同青聯會少數工作同志對他們的態度有關），因此一點點的活動，便會使他們感到一種額外負擔的感覺，所以他們有一種要求（尤其廳方負實際責任的幹部同志），希望青聯會今後的活動，事先能透過教育廳方面，並盼望能夠事先大家商量一下。』」<sup>37</sup>藉此可知青聯會的位高權重，一個青年團體，竟能在黨軍的奧援下，使台灣省教育廳與各校校長視其通知為

35 蔣經國檔案，〈潘振球報告教育廳及各校校長對目前青年運動之看法等〉，《忠勤檔案—總政治部任內重要文件》，3010.82/5044.01-053，1952.05.06。

36 曹志源，〈國內國外二十年（1949-1969）〉，頁40。

37 蔣經國檔案，〈潘振球報告教育廳及各校校長對目前青年運動之看法等〉，《忠勤檔案—總政治部任內重要文件》，1952.05.06。

38 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82次會議記錄，油印本，1951.02.08。

命令，造成這種怪異現象的產生，未嘗不是巨變時代的特有產物。

此外，該份檔案中，潘振球指出教育當局與青聯會在發起的活動時，所出現的摩擦，希望「最好請教育長（蔣經國）召集有關同志先作一詳細之詢問，然後與有關之教育廳陳廳長（陳雪屏）及谷正綱先生（中改會第二組主任委員）等當面談一談，使中間不生隔膜。」也呼應著上文所述青聯會的領導分歧問題。

雖然青聯會與教育當局的目的一致，皆視政府的非常時期教育方針為圭臬，但兩者在觀念上仍有不同，「教育廳及各校校長對於目前青年運動有一基本看法，就是他們以為目前台灣很安定，只要加強學校的政治教育、愛國教育使學生對主義有信仰，有國家觀念，至於運動（指大的集會和遊行等）則非有特殊需要，可以不必採取這種方式，以免影響學生學業」。這與青聯會在黨軍奧援下所舉辦一次又一次的大規模活動，似乎並沒有聚焦。而這種以青聯會來領導青年運動的形態，也隨著國民黨在青年運動的規劃之下，決定成立救國團，終劃下句點。

### 三、國民黨改造下的產物—救國團的籌劃與成立

1952年3月29日，總統蔣介石發表籌組成立救國團的聲明，這個看似突然其來的宣言，其實並非臨時起意，而是經由國民黨內中改會內部為時近一年的籌劃而成。早在中改會第82次會議（1951.02.08）中，蔣介石便主張應在青年和婦女運動上，再「發動青年反共先鋒隊及婦女反共愛國會等組織」，因為他認為「共匪最大特點，就是其能利用婦女及煽惑青年。」<sup>38</sup>，而在其指示下，中改會迅速於隔週的第85次會議（1951.02.14）將青年反共先鋒隊（以下簡稱先鋒隊）的籌組案納入該年度黨部工作主要目標。<sup>39</sup>

39 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85次會議記錄，油印本，1951.02.14。

1951 年的青年節前夕，中改會的第 95 次會議（1951.03.08）由第二組提出「擴大慶祝第八屆青年節指導綱要」，綱要中認為應當將青年節的慶祝活動，應由去年全國青年在共匪滲透欺騙劫持下的「覺醒運動」昇華為全國青年精誠團結為反共抗俄而努力奮鬥的「行動階段」，鼓勵「自由區的青年到前線去，作保衛台灣反攻大陸的先鋒隊」，發動青年踴躍參加。<sup>40</sup>

五月，中改會第 132 次會議（1951.05.15）擬定「籌組青年反共先鋒隊原則草案」，希望能夠「團結全國革命青年的意志和力量」，而「以在校高中以上青年及社會青年為對象，凡信仰三民主義、有犧牲決心與服務熱誠者，不分男女均得志願參加。」並決定以「隊」的方式組織，進以完成政治、戰鬥、技能、生活、體格等五項訓練。同時，將先鋒隊的任務及工作，區分為反攻前、反攻時與反攻後等三個階段。<sup>41</sup>

---

40 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 95 次會議記錄，油印本，1951.03.08。

41 反攻前：其任務是去除依賴心、轉移社會風氣、創造戰鬥環境。其中心工作有：一、加強宣傳：配合政府把握時機，展開各種反共抗俄、增進政府和領袖威信的宣傳活動；二、服務工作：舉辦各種社會民眾服務及有關青年升學、就業輔導工作；三、社會調查：協助政府保密防奸、檢舉違法奸商，根據所學，以實習方法作各種技術性的政治、經濟、社會等調查與統計，提供政府參考；四、勞動增產：推行社會克難運動，由勵行戰時生活做起；五、發動捐獻：利用時機配合政府舉行一人一物、一人一元、一人一書、一縣一機等捐獻運動。

反攻時：其任務是隊員人力、物力、財力充實作戰條件，隨軍反攻。其中心工作有：一、軍中服務：發動敬軍、愛軍、勞軍運動以及幫助前方軍事性的勞動與醫藥救護；二、戰地勤務：參加防空、救護工作運輸工作、組織戰地工作隊，隨軍反攻擔任情報、通訊、救護擔架組訓民眾等工作；三、參加戰鬥：如部隊需要，隨時武裝，做下級軍事幹部及列兵之補充，直接參加戰鬥行動。

反攻後：其任務是澈底肅清共匪，鞏固治安、重建社會秩序，其中心工作是：一、清理戰場：每於戰鬥勝利後，協助國軍掩埋屍體，管理俘虜、收集戰利品、統計戰果資料等有關清掃戰場工作；二、安撫民眾：在收復城鎮時，代表國軍對一般民眾即時展開各種撫慰工作，以去除驚恐心理，爭取民心信賴政府取得合作；三、救濟難胞：隨帶政府救濟物資，對收復地區之無衣、無食、無助之被難同胞，辦理急賑、安置、遣送等救濟工作；四、維護治安：組織青年，協助地方政府辦理消防、維持交通、恢復電訊及有關治安之維持等工作；五、建立秩序：協助政府清查戶籍調查、潛伏匪諜受理、告密、登記傷亡、重編保甲，必要時，臨時從事保甲工作以便鞏固治安，儘速恢復地方秩序。參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 132 次會議記錄，油印本，1951.05.15。

這份草案大致建構出先鋒隊的雛形，並決議推派谷正綱、張其昀、陳雪屏、鄭彥棻、蔣經國、郭澄、連震東等人組成小組，研擬具體方案，並由中改會第二組主委谷正綱負責召集。然而，此次會議更值得我們重視的是，擔任幹部訓練委員會主委的蔣經國所提出的三點建議，分別為：

- 一、黨對青年運動亟應做明確之決策與積極之領導，第二組所提籌組青年反共先鋒隊原則草案第二條規定，以個人為組織單位確有必要，因中國青年反共抗俄聯合會係團體為組織單位，其對反共抗俄之工作固有良好之成就，然在黨的組織意義上則必須以個人為單位，始能組訓優秀青年準備吸收入黨。
- 二、對今後青年運動必須統一領導，凡有關青年運動之團體均應由黨指揮與運用，青年反共先鋒隊組織成立後，一切以個人為單位之組織，似宜自動解散，一併加入先鋒隊，俾能集中力量。
- 三、於如何統一青年運動一點，擬請仍由第二組擬具統一青年運動方案，一併提會討論。

由上述三點，可明確得知即將成立的先鋒隊與青聯會的最大差異即在於組織方式的不同，青聯會是以團體作為組織單位，而先鋒隊則擬以個人作為組織單位。同時，先鋒隊成立以後，將合併一切以個人為單位的組織，並主導青年運動的發展，但若是如此，則青聯會實屬以團體為單位之組織，理應不予併入，再者，目前雖由第二組負責主導先鋒隊之規劃，但蔣經國似乎對於先鋒隊的規劃具有相當程度的興趣。<sup>42</sup>

此次會議結束後，中改會延宕半年之久，才又針對先鋒隊的議題再作探

---

42 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 132 次會議記錄，油印本，1951.05.15。

討，其主要原因則由於諸公對於青年領導問題意見不甚一致所致，而在這段時間內，蔣經國對於青年運動的投入，相當積極。不但以總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大力協助青聯會於暑期舉辦軍中服務，兩者建立密切的互動網絡，並於1951年9月11日及10月4日，親自主持兩次青年問題座談會，廣泛討論青年運動的問題。

第一次的青年問題座談會中，蔣經國直陳過去與現在的青年運動都是「沒有組織」且「散慢的」，而認為青年運動應該遵守五項原則：

- 一、必須接受三民主義的思想指導。
- 二、必須接受中國國民黨的實際領導。
- 三、必須適合中國國情與需要。
- 四、必須具有革命理想與目標。
- 五、必須由青年自己領導，青年本身問題由青年自己解決。<sup>43</sup>

與會者除對過去青年運動的領導方式及派系等諸多問題及缺失作出批判外，多認為發起及統一青年運動有其必要性與急迫性，甚至亦有人指出，應該放下身段學習中共的青年運動方式，以強化青年的組訓。<sup>44</sup>而也認為部分黨內同志對與青年運動的意見紛歧與阻饒，是造成目前青年運動無法順利推

<sup>43</sup> 此次會議除蔣經國外，並邀集王志鵠、王昇、章群、李煥、錢野桐、蕭永泰、范魁書、聶鍾杉、江海東、王樹權、江國棟、傅雲、黎元譽、沈祖懋、俞諧、高偉時等人參加。參見蔣經國檔案，〈青年問題（第一次）座談會〉，《忠勤檔案—總政治部任內重要文件》，1951.09.11。

<sup>44</sup> 諸如章群提到：「當年嚴北溟（匪黨）在浙江辦理『浙江潮』時，常常利用座談會，吸引很多青年……今日青年運動需要應用各種新方式，我們也可模仿這種方法，宣傳舉辦多種座談會，讀書會，歌詠團體，藉以接近青年，吸收優秀青年」；俞諧也認為「從近年來共匪發動的『捐獻武器運動』來看，這個運動有其領導的統一性、規律性與工作的階段性，而且與政治經濟外交多方面配合得很好，所以運動的成效很高」。參見蔣經國檔案，〈青年問題（第一次）座談會〉，《忠勤檔案—總政治部任內重要文件》，1951.09.11。

行的主要原因。對此，蔣經國於會中指出「群眾」的重要性，認為「沒有群眾的革命，自然會落空」，而在當前國家存亡的關頭上，救黨應是最重要且急迫的，認為派系雖會影響成效，但並不是那麼絕對，同時聲稱今後的青年運動應建立在本黨主義和政治主張的號召之下。

相隔不到一個月，蔣經國又再次舉辦第二次青年問題座談會，10月4日會議中，主要商討議題即以青年反共先鋒隊作為主軸。會中則先由李煥宣讀〈青年反共先鋒隊組織計畫綱要〉及〈青年反共先鋒隊工作綱領〉兩份草案。<sup>45</sup>

計畫綱要中之內容，大致與中改會第132次會議中的〈青年反共先鋒隊原則草案〉雷同，但第三點上則修訂為「為統一青年的力量與行動，中國青年反共抗俄聯合會所屬各工作隊均納入青年反共先鋒隊，以奠定青年反共先鋒隊的基礎」，可見欲將青聯會併入青年先鋒隊的構想，早已形成。而在工作綱領中，仍將先鋒隊賦予三階段性的任務，並擬出工作態度與方法準則，可謂是〈青年反共先鋒隊原則草案〉的再延伸。

會議中首先由李煥報告目前中改會對於先鋒隊的規劃情形，他認為由於諸委員對青年領導問題意見不甚一致，故使先鋒隊在規劃上有被擱置的情況。與會者隨後也分別針對先鋒隊相關問題進行座談。例如對先鋒隊應具何種性質，多數認為先鋒隊應具有「政治意涵」；而在組織上，主張採秘密進行壓倒性的多於公開號召；在與國民黨的互動上，主張脫離國民黨或成為國民黨外圍組織的意見皆有；而在成員上，除吸收學生外，也有提出應積極吸收原住民或軍、工、農等社會青年的提議。而在領導人方面，不少與會成員還

45 蔣經國檔案，〈青年問題（第二次）座談會記錄〉，《忠勤檔案—總政治部任內重要文件》，1951.10.04。

是認為應由總統親自領導最為適當。蔣經國亦在會中作出五點建議，表示青年應秉持「讀書不忘救國」的信念，認為先鋒隊應隸屬於國民黨且需具有「政治性」，至於以秘密或是公開方式籌組，則必須視環境而決定，而為達目的，以任何方式籌組，亦無不可。

十一月，中改會終於第 235 次會議（1951.11.05）再針對半年前擬定的草案加以修訂。並決定擴大邀集內政部、教育部、國防部及總政治部等部會商討，對於草案作出修正。<sup>46</sup>而在第 235 次會議的前夕，一份由李煥呈交給蔣經國的「今天下午中央改委會開會，先請參閱之資料」中，提到「自籌組青年反共先鋒隊問題提出後，一般反對者所持理由如下」：

- 一、青年反共先鋒隊成立以後，恐將再蹈三民主義青年團之覆轍，形成組織對立，影響黨的領導。
- 二、目前台灣環境安定，社會進步，青年反共先鋒隊成立以後，恐將影響安定，妨礙進步。
- 三、青年反共先鋒隊成立以後，必以學生為主要對象，足以影響學生學業。
- 四、青年反共先鋒隊成立以後，如少數學生參加，多數不參加，增加學校管理上之困難，故以各校全體學生參加較為方便。
- 五、青年反共先鋒隊成立以後，必須大量經費增加政府財政之困難。
- 六、目前反共無期，青年反共先鋒隊成立以後，無事可做，恐將徒具組織形式。
- 七、青年組織教育性應重於政治性，青年反共先鋒隊如必要成立，應偏重技能方面之訓練。

46 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 235 次會議記錄，油印本，1951.11.05。

八、青年反共先鋒隊之戰鬥意味太強，一般青年之家長必然阻止青年參加，恐難收預期效果。<sup>47</sup>

可想而知，這份適時的文件，應對中改會第 235 次會議，發生了相當的影響力，使原先的規劃，必須作出大幅的調整。中改會第二組遂在 12 月 29 日，再邀集余井塘、程天放、鄭介民等同志，綜合各項建議，重新研擬先鋒隊的籌組方式，並作出三點重大決定：

- 一、先鋒隊由政府主辦，本黨以黨團方式領導其活動。
- 二、青年反攻先鋒隊以全國高中以上學校學生及遴選優秀社會青年，年在十六以上，二十五歲以下者參加。
- 三、為適宜一般青年之普遍參加青年反共先鋒隊，擬改稱為中國青年反攻抗俄救國團。<sup>48</sup>

1952 年 1 月 22 日，中改會第二組又邀集青年運動委員會召集人及國民黨內對於青年組訓有經驗的同志，彙訂出「籌組中國青年反共抗俄救國團原則草案」，並於中改會第 288 次會議（1952.01.31）提出，修訂後通過。<sup>49</sup> 草案中，團員規定高中以上學生一律參加，社會青年則以年滿 16 歲至 25 歲合於規定標準者為限；將屬性定位為「屬於政府」，但國民黨將「以黨團方式領導其活動」；同時規定團員應注重「政治」與「軍事技術」等兩項訓練。<sup>50</sup>

47 蔣經國檔案，〈自籌備青年反共先鋒隊問題提出後一般反對者所持理由〉，《忠勤檔案—總政治部任內重要文件》，1951.11.04。

48 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 288 次會議記錄，油印本，1952.01.31。

49 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 288 次會議記錄，油印本，1952.01.31。

50 組織體系方面，則擬在全國設團、省設分團、縣市設總隊、縣市以下地區設大隊、大專學校依學生人數之多寡，設總隊或直屬大隊、中等學校依其學生人數之多寡，設大隊或直屬中隊，而分隊為基層單位由團員十五人至二十五人組成之。參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 288 次會議記錄，油印本，1952.01.31。

在第 288 次會議決議中，將名稱應定為「中國青年反共抗俄救國團」或為「青年反攻先鋒隊」，交由國民黨總裁蔣介石裁示。若我們由第 297 次會議記錄可知（1952.02.19），蔣介石於 2 月 5 日批示：「青年反共救國團可也。」<sup>51</sup> 確定了正式名稱。至此，先鋒隊改名為救國團，在歷時近一年的籌劃後，終告完成。

#### 四、救國團的領導權問題

1952 年 3 月 29 日，蔣介石總統選定在以紀念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青年節」紀念日當天，在廣大的民眾簇擁下，慷慨激昂的發表「國家需要青年，青年創造時代」的宣言，表示決定成立救國團的決心。蔣介石認為：「時代又在考驗青年了，也惟有青年能創造時代」。因此：

為了有效號召，並正確領導我全國青年，始能普遍地展開第三次的青年大結合，我現在已決定成立「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的正式組織，以適應愛國青年的共同要求，並將其納入統一的組織之中，增進其智能，鍛鍊其體魄，訓練其工作技術，加強其革命信念，使全國青年在反共抗俄總動員運動的號召之下，努力推行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政治的全面改造。<sup>52</sup>

隨後，透過各報章媒體大肆鼓吹宣傳，這股熱潮迅速蔓延，一發不可收拾。許多團體及學校紛紛表態，響應成立救國團的號召，從每日的報紙觀

51 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 297 次會議記錄，油印本，1952.02.19。

52 國史館，《中國民國史實紀要（四十一年）》，1995.05，台北：國史館，頁 440-443。

之，可見這股熱潮正持續擴大蔓延中。<sup>53</sup>

象徵著愛國壯舉的行為，不斷出現在相關報導之中，寫血書、刺青這種對身體留下暫時或永恆的傷害，以示自己對於救國的支持舉動，則成為當時對於國家忠誠的象徵，例如在《中央日報》6月4日的報導，青年軍聯誼會百餘名會員，「歃血宣誓」參加青年反共救國團，即席血書「一寸山河一寸血」錦旗一面，推代表攜呈總統，表示其決心。<sup>54</sup>翻開6月28日報紙亦可見，花蓮縣卓溪鄉太平村全體青年124人為響應總統偉大號召，已於本(六)月一日踴躍參加「反共救國團」，並以「反共抗俄」、「反共救國」等字樣刺臂宣誓，以表愛國之赤誠。<sup>55</sup>而這種舉動，在當時獲得了輿論高度的評價。

青聯會也不落人後，於四月底發表宣言鼓勵全國青年參加救國團，<sup>56</sup>而在4月30日，該會更發表〈上電總統致敬〉一文，表示青聯會將會「首先力

53 相關報導可參見《中央日報》第三至五版，例如〈青年們振奮起來參加反共救國團—青年軍聯誼會告青年〉，1952.04.30；〈臺大、師院青年參加反共救國團，發表電文願以事實報效國家〉，1952.05.01；〈海內外青年一致奮起熱烈參加反共救國團〉，1952.05.02；〈新竹全體青年學生響應青年大團結，上電總統表示決心，一致參加反共救國團〉，1952.05.03；〈勇敢接受時代考驗，參加革命戰鬥序列，愛國青年紛紛馳電響應，熱烈參加「反共救國團」〉，1952.05.03；〈北花彰各中學同學響應總統號召，通電參加反共救國團〉，1952.05.05；〈擴大組織健全領導省農會響應青年大團結，臺東青年響應成立反共救國團〉，1952.05.06；〈各地青年齊奮起參加反共救國團，紛電響應總統號召〉，1952.05.07；〈各地青年團體響應青年團結，相繼上電總統致敬〉，1952.05.08；〈各地青聯會繼起響應，熱烈參加反共救國團〉，1952.05.09；〈響應青年大團結，山地同胞不後人，上書總統參加反共救國團〉，1952.05.10；〈基隆、屏東、北師青年響應總統偉大號召，團結一致參加反共救國團〉，1952.05.12；〈臺中一中響應總統號召參加反共救國團〉，1952.05.13；〈海內外青年群響應總統號召，誓願參加反共救國團〉，1952.05.14；〈山地青年致敬總統〉，1952.05.17；〈青年志切報國，請速組救國團，各地青聯紛紛呼籲〉，1952.05.18；〈花蓮、臺東、南投青年竭誠響應總統號召，擁護成立青年反共救國團〉，1952.05.19；〈南部回教同胞決參加救國團〉，1952.05.19；〈宜蘭青年們響應救國團肅電總統致敬〉，1952.05.22；〈警校警官訓練班響應青年救國團〉，1952.05.23；〈嘉各界青年響應救國團〉，1952.05.30 等相關報導。

54 〈各地青年軍聯誼會昨慶復員六週年，響應參加青年反共救國團〉，《中央日報》，1952.06.04，第五版。

55 〈花山地青年參加救國團刺臂宣誓效忠總統〉，《中央日報》，1952.06.28，第四版。

56 〈青聯會號召全國青年參加青年反共救國團〉，《中央日報》，1952.04.29，第四版。

行、百折不回、至死不渝，正確的朝向您所指示的方向前進」。<sup>57</sup>而在1952年暑期軍中服務結束以後，青聯會便表示期盼併入救國團中，進而齊聚力量，共同響應總裁的號召。更在救國團10月31日成立前夕，作出一致參加的決議。

青聯會同時並邀集指導委員對於該會自成立以來所扮演的角色及定位，作出共識性的評語，表示自己曾「在國家最危險的時候，掀起青年救國運動的高潮，領導愛國青年納入革命的主流，其功績是不可磨滅的」；「又認為有了青聯會三年來工作的成就，才能形成青年反共救國團的誕生，所以救國團的成立，是青聯會組織的擴大與加強。」<sup>58</sup>而這個共識，則形成日後對於救國團是延續青聯會工作的一致性言論。

事實上，當總統蔣介石在3月29日發表決定成立救國團的宣言時，其實由誰來負責救國團，人選尚未定案。國民黨內多認為應該由總統親自領導青年最為適當，至於為何由蔣經國出任救國團主任，似乎值得探討。

中改會於第332次會議（1952.04.24）中，蔣介石總統交付一份〈中國青年反攻救國團學校團務高中以上學校學生軍事訓練配實施要點〉在該會中討論，明確指出「中國青年反攻救國團，對各級學校團務之開展，與高中以上學校學生軍事訓練之實施，在原則上應密切配合，相輔相成，在組織上，應融為一體，以收統一領導之功效」。<sup>59</sup>由此可見，依照總統的裁示，救國團與學生軍訓的規劃，應融為一體。換言之，要掌握救國團的主導權，也必須掌握學生軍訓的主導權。

57 〈(青聯會)上電總統致敬〉，《中央日報》，1952.04.30，第一版。

58 鄭清漢，《自由中國青年在戰鬥中》，頁11。

59 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332次會議記錄，油印本，1952.04.24。

在此會議中，台灣省教育廳長陳雪屏亦提出〈中國青年反攻救團團組織系統草案〉乙份，對救國團的組織體系作詳細劃分，草案中規劃設置中央團務委員會，由「國防部長或次長、教育部長或次長、內政部長或次長、總政治部主任或副主任、中央改造委員會秘書長或副秘書長及一、二、三組主任或副主任(由政府聘請)與其他特聘人士」兼任委員。這份規劃有趣的是，原本負責規劃救國團的中改會第二組，僅被列為委員之一。此外會議決議「推陳雪屏、谷正綱、鄭彥棻、袁守謙、蔣經國、唐縱、萬耀煌、沈昌煥、崔書琴等九同志組織小組，予以審查，再行提會核議。」召集人亦改由陳雪屏與谷正綱兩人同時擔任，似乎也頗令人玩味。<sup>60</sup>

而於中改會第 338 次會議（1952.05.08），該小組即在審查完竣後，提交〈籌組青年反共救國團案審查意見〉乙份，決議事項有四，其中第一點便稱：「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隸屬於國防部總政治部，設團務指導委員會，負責全國團務之設計，指導委員會由總政治部聘請有關人士擔任之。」將救國團隸屬於國防部總政治部，並決定由總政治部聘請有關人士擔任指導委員，同時決定「設置團長一人，由總政治部報請國防部派任之」。<sup>61</sup>

而當救國團隸屬於總政治部之後，對於學生軍訓的隸屬關係，也有所調整。藉由 1952 年 6 月 20 日的一份國防部開會通知可知，學生軍訓籌備委員會，原以「奉國防部長批示，請羅機次長任主任委員，由教育部及台灣省政府代表為副主任委員外，並由國防部部長辦公室、人員司、總政治部、第一

60 國軍檔案，〈抄中改會原代電〉，《青年反共救國團組織執掌及活動》，總長辦公室，1930.5022，1952.05~1954.09，1952.05.12。

61 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 338 次會議記錄，油印本，1952.05.08。

62 國軍檔案，〈為函請會派學校軍訓籌備委員會代表一員，並準備開會資料由〉，《普通學校軍訓實施辦法》，總長辦公室，0612/80601，1952.06-1954.10，1952.06.20。

廳、第四廳、第五廳、預算局、陸軍總部、聯勤總部各派代表一人為委員」。<sup>62</sup>但於7月1日的國防部檔案中得知，學生軍訓籌備委員會的主任委員人選已「於六月三十日，提請參謀會報決定由貴部（總政治部）擔任」。由此可知，總政治部此時也掌握了學生軍訓的推行。同時該檔案中亦可見：「奉（參謀）總長裁決，主任委員由總政治部蔣（經國）主任擔任。」<sup>63</sup>換言之，救國團與學生軍訓皆隸屬於總政治部。

7月9日，蔣經國於總政治部召開學生軍訓設計督導委員會。會中台灣省教育廳長陳雪屏提出四點建議<sup>64</sup>，表示學生軍訓若依照目前國防部的規劃，窒礙難行。因此會中決議，「為使學校訓導、軍訓、青年反共救國團之訓練三者合一、互相連貫、統一步調、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軍訓交付青年反共救國團辦理」。至此，學生軍訓始交付由救國團主辦。

7月14日，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再擬訂救國團籌組方案，「擬聘張其昀、周至柔、郭寄嶠、程天放、吳國楨、錢思亮、谷正綱、陳雪屏、任培

63 國軍檔案，〈為送有關學校軍訓籌委會文卷函請查照由〉，《普通學校軍訓實施辦法》，1952.07.01。

64 台灣省教育廳長陳雪屏所提出的四點建議為：

- 一、台灣省中等學校學生均為走讀生，因為交通方便，學生是配合火車行駛時間來去，在校時間很少，同時除師範學校外，一般學校都無宿舍設備，所以對於學校軍訓的生活管理的困難，是值得注意的問題。
- 二、現在中等學校的課程：每週除以增加軍事課程四小時外，另有勞作（專門技能）兩小時，公民訓練一小時，合計七小時，現在照新課程表實施，學生負擔很重，而升學所需的基本課程，反而減少，這也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 三、原來我們的目的是整頓學風，使學生生活規律化，今天看到國防部的計畫是進一步達到養成預士的目的，在今天現實環境下能否達成此種任務值得考慮。
- 四、全省中等學校教職員共有兩千餘人，如依國防部之計畫，各校軍事教官要派出九百餘人，已佔教職員總數三分之一強，學校宿舍的缺乏，以及所擔任教學時間的懸殊，亦應考慮。參見國軍檔案，〈台灣省高中以上學校普遍實施軍訓計畫〉，《建立後備兵員案》，總長辦公室，1622/1540，1952.02-07。

道、劉真、沈昌煥等十一人」擔任團務指導委員，並請總統從中「指派一人，充任團長」，以便迅速展開救國團的工作。從所開列的名單可知，蔣經國將自己漏列其中。但參軍長隨即發現並建議總統，由於救國團隸屬於總政治部，故「擬加聘蔣經國同志為委員，並兼任團長，俾能集中事權，以赴事功。」這份文件隔日（1952.07.15）便獲得總統同意照辦。惟認救國團的負責人「不必稱為團長」，可另擬其他名稱，8月1日研擬後建議總統「似以改稱主任較佳」，隔日（1952.08.02）便獲得同意，<sup>65</sup> 蔣經國終成為第一任救國團主任，獲得青年運動的領導權。而於前一日，救國團籌備處成立，並決定於北投政工幹校辦公。<sup>66</sup>

九月初，中改會第392次的會議中（1952.09.01），認為應調整目前現有的青年團體，會議中決議：

救國團成立以後，現有之社會青年團體，其工作性質與救國團相同者（如中國青年反共抗俄聯合會），應歸併其組織，其工作性質不相同者（如回民青年反共建國大同盟、台灣青年文化協會），應透過各級社政主管同志，依據法令健全其組織，始能發揮青年力量，以配合反共抗俄復國之要求。

可知，青聯會併入救國團之中，並非僅為「自發性」的舉動。同時目前將青聯會併入救國團之中，其原因是基於工作性質相同。會中也決議在救國團於各校組織建立以後，「各校社團除學術性者，應予保留並由各校訓導長督

<sup>65</sup> 國軍檔案，〈為擬加聘蔣經國同志為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指導委員並兼任團長敬乞鈞核示遵由〉，《青年反共救國團組織執掌及活動》，1952.07.14。

<sup>66</sup> 國軍檔案，〈為檢呈青年救國團籌備處擬訂之各項章則草案請鑒核示遵由〉，《青年反共救國團組織執掌及活動》，1952.08.01。

導加強其工作外，其他康樂性、服務性之各種社團，均一律歸併於救國團，以求工作領導之統一」。因此當救國團進入校園以後，亦掌控了康樂及服務性的各個社團。

此次會中將救國團定位為國民黨領導青年運動的外圍組織，並規定救國團在學校中應受知識青年黨部之指導。而知識青年黨部也應配合救國團所建立的組織體系，使國民黨的基層組織能夠密切配合救國團的建制。會中並認為救國團應成為「領導青年推行總動員之主力，尤應以推行文化改造及社會改造運動為中心任務」的青年團體。<sup>67</sup>

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在主導學生軍訓與救國團業務之後，救國團與國民黨與軍方的隸屬關係更具明確化，同時救國團也將青聯會等青年團體併入其中，成為實際主導青年運動的組織。雖在第392次會議中（1952.09.01）與會者均認為成立救國團迫在眉睫，「應於本年十月各校開學以前從速成立」，<sup>68</sup>但是救國團仍特別選擇在1952年10月31日蔣介石總統六六誕辰成立，作為賀禮。在成立大會當天，蔣經國認為：「從今天起，中國青年的生命和革命領袖的生命、中國青年的前途和國家民族的前途，更密切的結合在一起。」<sup>69</sup>對

67 會議中認為救國團當務之急應推行的工作如下：

- 一、各級學校之民族精神教育及軍事技術訓練，應由救國團配合各級學校，加強實施。
- 二、發動青年成立各種服務工作隊，積極從事各種社會服務、軍中服務及戰時服務等工作。
- 三、發動青年積極參加各項敬軍、勞軍、從軍工作，以鼓舞士氣，提高國軍戰鬥力量。
- 四、發動青年到農村、工廠、礦場去參觀勞動生產等工作，以增加生產，擴大建設。
- 五、發動青年團體及各學校組織巡迴文化工作隊，普及社會宣傳，提高民眾反共情緒。
- 六、救國團各級組織應配合各級學校按期舉行動員月會，使一切社會改造工作及文化改造之工作，應能透過動員月會貫徹實施。
- 七、救國團應運用各級組織配合學校，達成肅奸防諜之任務。

參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392次會議記錄，油印本，1952.09.01。

68 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392次會議記錄，油印本，1952.09.01。

69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總團部，〈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成立大會宣言〉，《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出版日期不詳，頁16。

此，蔣介石總統亦欣慰的表示：

我自由中國的青年子弟們，竟能自動自發的適應革命的要求，響應國家的號召，在此革命復興的基地，接受統一的領導，納入堅強的組織，發揮偉大的力量，以參加反共抗俄的戰時工作，實在使我感到無比的欣慰。

期許救國團能成為具有「教育性」、「群眾性」與「戰鬥性」的青年組織，希望青年能把握這「千載難得的機會」，來達成「時代考驗青年，青年創造時代」的目的。<sup>70</sup>

## 餘論

當蔣經國成為救國團第一任主任，而在救國團即將成立之前的 10 月 6 日，徐復觀撰寫了〈青年反共救國團的健全發展的商榷〉一文，刊登於《自由中國》刊物。該文以「我們應以最大的期待祝其成功，祝其能真正增加反共抗俄的力量」作為開端，對於救國團若干的建議。<sup>71</sup>

該文認為救國團在性質上並不夠明確，其縱使在總統號召之下成立，但仍必須在國家體制之下進行，應成為「政府中之一機構，作為政府之一臨時措施」；同時認為救國團的工作與國民黨有過度重疊性，而對救國團成立之

70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總團部，〈總統對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成立訓詞〉，《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出版日期不詳，頁 6。

71 徐復觀，〈青年反共救國團的健全發展的商榷〉，《自由中國》，7 卷 8 期，1952.10.16，頁 10-11。

後，加諸學生過多的任務，亦表不滿。<sup>72</sup>因此呼籲「救國團的訓練，不得反礙正常教育」，同時在領導上，應保持教育系統及學校的一元化，不應另生枝節。為達此目的，徐復觀建議救國團主任「不妨由教育部長兼任，以領導學校青年為主，其副主任由政治部主任代表國防部兼任，以領導社會青年為主，並兼指導學校之軍訓」。

救國團主任蔣經國見到此篇文章之後，憤怒異常，藉由雷震在他的日記中 1952 年 10 月 27 日（星期一）記載著這麼一段話：

昨天（王）新衡來電話，我不在寓，今天特去電話，渠說經國閱了佛觀（徐復觀）之文大怒，認為這是與他過不去，為何從前不批評，待團章發表後，他擔任了團長始發表。我說團章未發表，人家不悉何事，無從寫文章。經國又說何以說程天放（時任教育部長）做團長，他不配做麼？又云佛觀很熟識，何以不告訴他？儆寰（雷震）也認識，何以登此文？總之文章所說的對不對，他未言一句。新衡認為文章所言是對的，但不宜此時講，新衡又說經國原不願做，是教育界混蛋，他們要學生簽名，他們要他出來做的。新衡亦認為救國團辦不好的，他請我以後別再寫。<sup>73</sup>

若再翻閱 1952 年 10 月 28 日（星期二）所記：

下午六時王新衡約餐，渠重複講起徐佛觀之文章，認為經國大發脾

72 文中提到救國團成立之後將交付學生之任務所列項目，把政府整個工作包括完了。該文並稱：「現在初高級的中學生，因為增加勞動生產教育及軍事教育，下午已經很少正式功課。若當（救國團）團員後，還要增加：『一、參加各種訓練，從事社會服務、協助文化宣傳、社會調查、推行政令，以及發動勞軍從軍及總動員運動。二、協助軍隊擔任運輸、情報、通訊、組訓民眾、整理戶籍、肅清匪諜、建立社會秩序，以及有關戰時工作。三、協助政府擔任教育、地方自治、土地行政，以及各項建設復興工作。』」故徐復觀認為：「試問有幾個在學的青年能夠實在的做好這些事情呢？」

73 雷震（傅正主編），《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1952）（四）》（34），台北：桂冠圖書，1989，1952.10.27（星期一）。

氣，從無如此之盛者。他並云經國不能幹，先是谷正綱要作，而陳辭修（陳誠）不肯，谷乃提出經國，渠躊躇半年，今始發表，而自由中國登此文章，顯然是與他過意不去，大意與日前相同。<sup>74</sup>

藉由雷震日記，可以得知徐復觀刊載在《自由中國》的這篇文章，無意中牽動了蔣經國的敏感神經（擔任救國團主任及領導青年運動的適當性），無怪乎，蔣經國見到以後，大發雷霆，不但認為舊識徐復觀不該寫，同時也認為雷震不該刊。

若從另一個面向來觀察，也可明瞭在蔣經國成立救國團以後，不單僅是徐復觀、雷震等人略有微詞，同時如王新衡更直指救國團根本辦不好，而抱持著同樣觀點還有谷正綱，他對於蔣經國所主導下的救國團，亦抱持反對的立場，谷正綱在11月中旬拜訪雷震時，即表明「他不贊成青年反共救國團，他謂年已五十，今天還來幹這個，他認為經國亦幹不好」。<sup>75</sup>令人感到有趣的是，這位擔任國民黨中改會第二組主委，原負責救國團（當時為先鋒隊）籌備的重要負責人，居然抱持著反對救國團成立及認為蔣經國做不好的觀點，而似乎能凸顯出國民黨內在統一青年運動的過程中，所發生的領導權矛盾問題。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蔣經國為何能出任救國團主任，領導青年運動，藉由本文探討可知，其既非僅憑教育界人士要求學生簽名而已，也似非由谷正綱所推薦，而是由於蔣經國自己手掌總政治部，一步步將學生軍訓與救國團納入該部隸屬，並獲得蔣介石總統的支持，才坐上救國團主任的位置。

最後，值得重視的是，徐復觀此文不但為《自由中國》發表評論救國團

74 雷震（傅正主編），《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1952）（四）》，1952.10.28（星期二）。

75 雷震（傅正主編），《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1952）（四）》，1952.11.18（星期一）。

的先聲，該文在發表過後，雷震似乎也接受了王新衡批評救國團「不宜此時講」的建議，在《自由中國》刊物中，冷處理救國團的問題。故，若透過薛化元的研究指出，直至 15 卷 9 期「祝壽專號」(1956.11.01) 之後，《自由中國》才又有對於救國團提出深入評論的文章刊登。<sup>76</sup>

---

76 薛化元，〈《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1950 年代台灣思想史的一個考察〉，台北：稻鄉出版社，1996.07，頁 283。該書對於《自由中國》在五〇年代評論救國團之分析頗為深入；或亦可參見拙著，〈黨團、軍事與教育——一九五〇年代學生軍訓進入校園之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2002 年 6 月。